

##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迁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快速增长,在获得了大量的充分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但是,这种发展是以各行业及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增长为前提的,发展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格局固化、二元结构扭曲、供需矛盾突出等结构性失衡问题。发展的不平衡与增长的高速度交织在一起,导致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分化非常明显,经济结构逐渐扭曲。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步向下调整,宣告了一个中高速增长新时代的到来;改革开放 40 年的前半段高速增长奇迹和后半段增长放缓既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果,也是结构变化及过度扭曲的集中爆发。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要加大经济结构优化的力度,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稳定的持续的发展新动能,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 经济增长 结构变迁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19)02-0011-08

DOI:10.13891/j.cnki.mer.2019.02.002

### 一、问题的提出

近代百年多来,中华民族切肤之痛便是落后就要挨打。由于封闭、保守及落后的腐朽制度和观念桎梏,200 多年前的中国曾经拥有全世界 1/3 的人口和 1/3 的财富,当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中国却被西方国家很快地甩到了后面,饱受后起的西方列强之经济压榨与政治欺辱。到 20 世纪 70 年代,拥有世界近 1/4 人口的中国,再次被西方发达国家甩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的门外,彼时国民总收入已不足世界的 2%。发愤图强、保留球籍成为当代中国最强烈的发展愿望与实际行动。作为动态创造的发展,不仅能够打破既有的旧的经济社会平衡,也会促进其向更高质量、更高层次演进。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在总体上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财富,尤其是北上广深等一线的国际大都市和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与地区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和激荡的社会转型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描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关键词,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实践使得中国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

放开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经过 40 年的努力,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体地位已基本确立。通过开放经济领域、引进外资、实施出口导向等政策,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 10% 左右,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达国家过去用两三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进程,我们只用了 40 多年。

经济增长是多重影响的结果(库兹涅茨,1966)。主流经济学的解释不仅涉及总产出,而且涉及经济的基本转型。对于人口和地理构成,甚至对于更重要的社会组织结构,增长与经济的各个方面有着深远的联系(Acemoglu,2012)。40 年的高速增长中,中国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具体表现为出口、投资、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不匹配,地区与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产能过剩与产业结构不合理同时并存,政府调控不适应市场机制等。中国在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40 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下的持续发展,虽然取得了丰硕的物质财富,但造成了资源能源消耗量均偏大,还恶化了自然环境。这样的经济增长注定是难以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尽快实现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彻底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2010 年中央决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2 年又指出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提高质量与效益;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十九大进一步强调,必须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中国 40 年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增速放缓,既是结构变化所引致的快速增长,也是不尽合理的

经济结构扭曲的集中爆发及其调整。

##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历史演进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各行业以及区域间的不平衡增长为前提的。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被称为“中国奇迹”,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区域格局固化、二元结构扭曲、供需矛盾突出等结构性失衡问题。不平衡与高增长等结构性问题相互交织,导致各地区经济分化非常明显,经济结构逐渐被扭曲。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向下调整,宣告了一个中高速增长的新时代的到来。增长奇迹和增长放缓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简单的经济周期现象,而是结构变化及过度扭曲的集中爆发。

### 1.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

从 1949 年建国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在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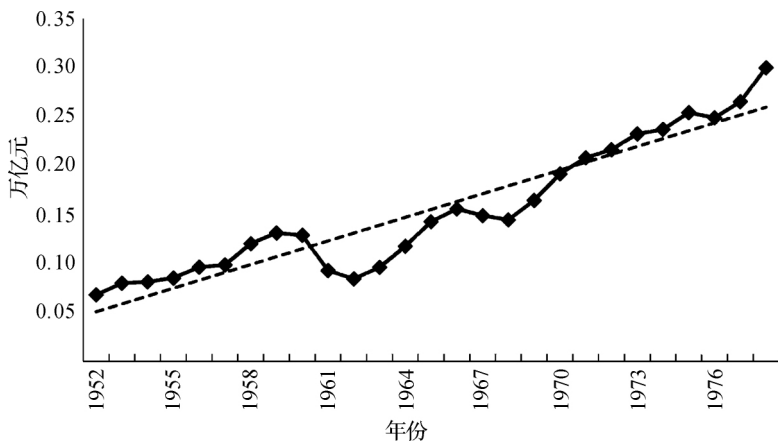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 1952 年到 1978 年经济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官网公布的 GDP 及其指数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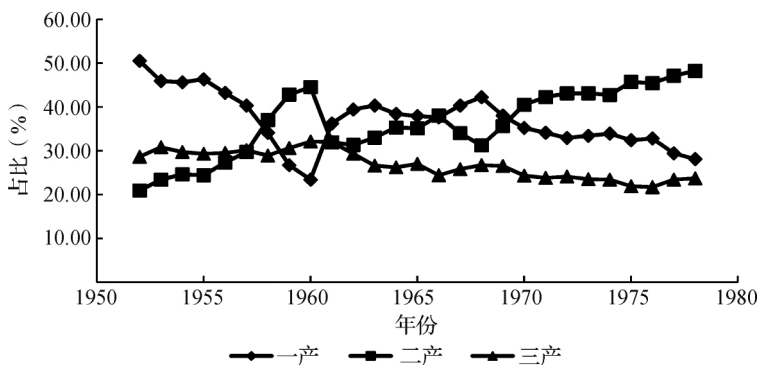


图 2 1952 年到 1978 年三次产业比例变动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官方网;汪海波著:《新中国工业界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6 年版。

总产值中占据绝大部分的比例。建国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由革命战争转为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转移。从 1949 年到 1954 年,国民经济主要处于恢复时期。从 1952 年到 1978 年为中国经济第一个腾飞发展的阶段。

由图 1 可以看出,1952 年到 1957 年,中国经济以一个较为稳定的速率增长,在 1958 年到 1959 年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增长;1960 年到 1962 年经济大幅下滑,1962 年到 1966 年再次恢复到一个快速增长状态。1966 年到 1968 年经济经历建国后的第二次下滑,在 1968 年到 1975 年,中国经济又进入一个稳定的增长期,1975 年到 1976 年经历第三次短期下滑,并在 1976 年到 1978 年,经济恢复快速增长。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短期波动性。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2 年全国二产占 GDP 比重为 20.9%,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的比例为 20.9 : 50.5;1957 年二产比重上升到 29.7%,较 1952 年上升 8.8 个百分点,二产与一产的比例为 29.7 : 40.3。1960 年比重上升到了 44.5%,较 1957 年上升了 14.8 个百分点,较 1952 年上升了 23.6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的比例为 44.5 : 23.4。1961 年到 1965 年期间,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时期。1965 年二产占 GDP 比重为 35.1%,二产与一产比例为 35.1 : 37.9;1966 年到 1976 年,二产占 GDP 比重上升到 1976 年的 45.4%,10 年间增加了 10.3 个百分点;二产与一产的比例由 1965 年的 35.1 : 37.9 变为 1976 年的 45.4 : 32.8;1978 年二产占比进一步上升为 48.2%,较 1976 年上升了 2.8 个百分点,工农业比重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

### 2. 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期间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

从 1978 年到 1984 年,中国一产平均占 30%以上,二产占 40%左右。在国际比较中,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明显偏高,说明农业具有巨大的劳动力吸收能力,但产值与就业不匹配,这也是二元结构并存的根本原因,产业结构的转型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各国历史阶段、技术和体制的不同,经济结构变动的波动过程、持续时间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这反过来也决定了不同的发

展水平。发展中国家之间虽然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也基本符合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规律。就中国而言,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传统二元结构和服务业发展滞后。

由图3可以看出,在1979年到1992年期间,中国GDP增速持续上涨。在1979年到1983年,中国经济以一个相对稳定的速率上涨;从1983年到1988年,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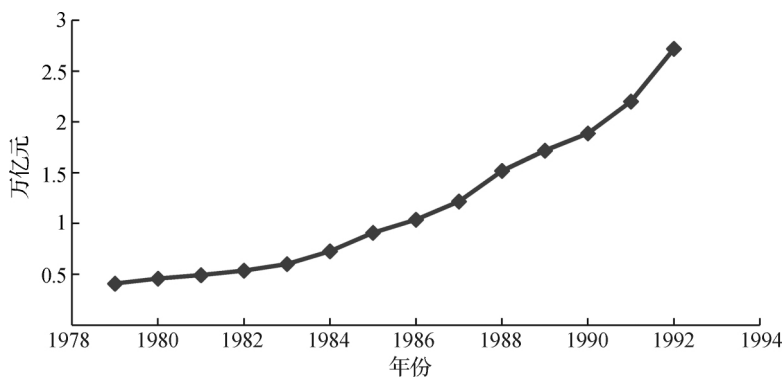


图3 1979年到1992年经济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官网。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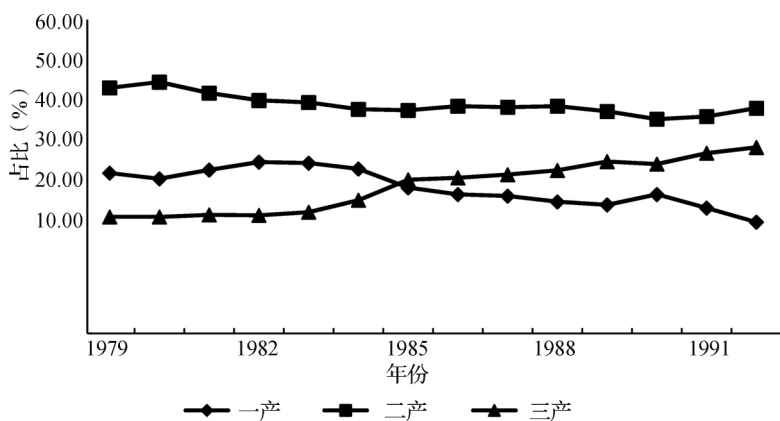


图4 1979年到1992年三次产业比例变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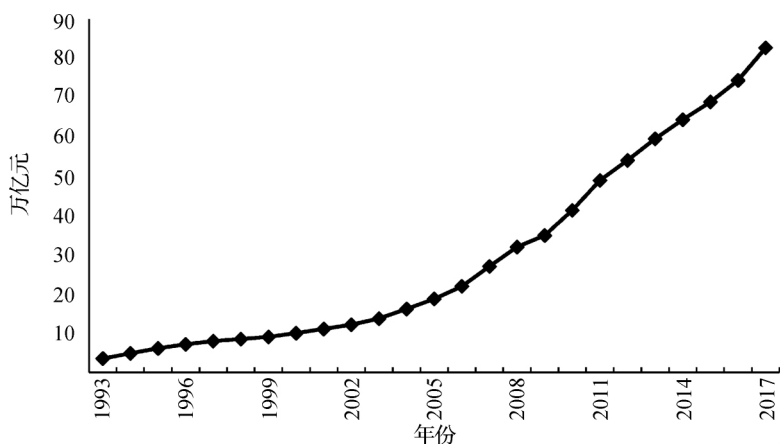


图5 1993年到2017年经济增长情况

济又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增长期;1988年到1989年的经济增速放缓,1989年到1992年经济再次出现快速增长。

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从1979年开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三次产业比重失衡,在1979年到1982年之间,中央开始相应的经济调整工作,进行农业体制改革,带动了农业的大发展。截止到1978年底,中国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为27.7:47.7:24.6;1982年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为32.8:44.6:22.6。在1979年到1982年,中央有计划的增加一产、放慢二产。1982年到1985年,由于调整后的经济结构相对平衡,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协调发展,到1985年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为27.9:42.7:29.4。1985年到1992年,改革由市场取向发展为全面展开,到1992年底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已变成21.3:43.1:35.6。

### 3.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

确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步入转型升级的轨道,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带动了世界经济的有力发展,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1%。国内经济发展也从高波动高速增长走向了低波动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由图5可以看出,从1993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稳定增长,2004年到2008年,经济增速明显加快。由于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到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明显有所放缓。加上当时4万亿的刺激,中国的经济虽然没有明显的下滑,但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产能过剩、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也是后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原因。

从图6可以看出,在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后,中国的一产占比持续下降,二产基本保持平稳。1993年到1996年,第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有所增加,1996年到2002年又有所下降;2002年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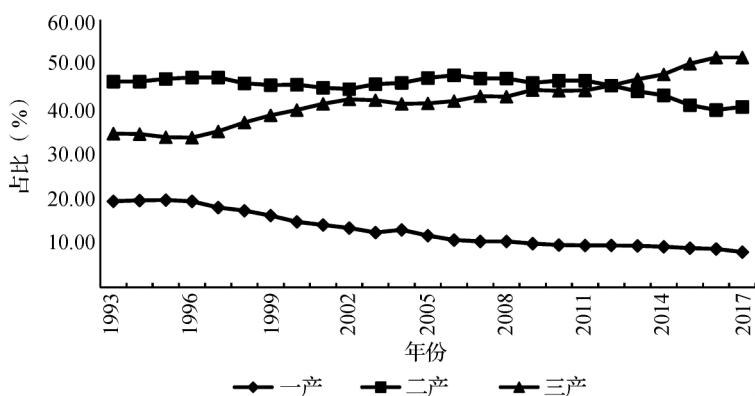


图6 1993年到2017年三次产业比例变动情况

2017年,又有几轮小幅度的上下变化。1993年确立市场经济后,三产稳步以相对较快的速率发展。1993年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为19.3:46.2:43.5,到2017年第一产业占比已降到10%以下,而三产也超过50%。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

用经济结构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重点在于考察发展过程中的要素构成与变化以及经济空间结构分布的增长效应的识别,研究基础则是增长理论的扩展和对中国经济增长不同视角的研究。结构主义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由一个产业部门的变化而引起的增长过程。如果说新古典的总量增长是一种均衡增长的话,那么结构主义经济增长则是一种非均衡增长。

在非均衡增长过程中,由于各增长要素之间存在边际利益差异,因此必然存在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和流动。从低收益部门到高收益部门的生产要素流动是不平衡发展的必然结果。结构效应是不可避免的,结构变量被认为是影响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而结构主义增长理论以新古典增长公式为起点,在考察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意义的基础上,引入结构因素重新解释经济增长,其著名的结构主义经济增长函数是:

$$G_Y = F\left(\frac{I}{Y}, G_L, X_S, X_A, X_E, X_F, X_D\right)$$

其中  $G_Y$  表示经济增长速度,  $I/Y$  表示投资同GNP的比率(资本存量增长的替代变量),  $G_L$  表示劳动力的增长,  $X_S$  表示劳动质量的度量,  $X_A$  表示劳动或资本自农业转移的度量,  $X_E$  表示出口增长的度量,  $X_F$  表示国际收支逆差的度量,  $X_D$  表示发展水平的度量。

除了劳动力和资本之外,由这种增长函数关系检验的解释变量还引入了结构变量,如资本和劳动力再

分配。因此,函数关系表明,结构主义经济增长函数把经济增长过程看作要素投入和结构转换共同促进的结果,从而分析结构转换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这一理论分析的指导下,我们试图通过考察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建立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相关函数,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和描述。

#### 1. 经济增长模型设定

在关于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的文献中,钱纳里(Chenery)和赛尔昆因(Syrquin)(1975)运用历史分析法,分析了100多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并建立了以下的回归模型:

$$X = a + b \ln Y \quad (1)$$

其中,  $X$  表示各产业部门的产值或就业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或总就业的份额,  $Y$  表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b$  表示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结构变动的测度。

钱纳里和赛尔昆因研究了产业结构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即在不同人均GNP水平上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水平及其差异,而我们要研究的是随着结构变化的经济增长过程。因此,钱纳里和赛尔昆因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模型不是反映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转换的理想模型。为了描述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我们假定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函数如下:

$$G_Y = F(SI) \quad (2)$$

其中,  $SI$  表示结构变化指数,是对一国产业结构时序变化的测度。通过转化钱纳里和赛尔昆因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的回归模型,从而可以将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函数关系式具体化:

$$G_Y = e^{C \cdot SI} - 1 \quad (3)$$

其中,  $C$  为结构变化的经济增长率的斜率,表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如果  $C$  为正值,表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反之,则是负效应。从而(3)式成为测度一国产业结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函数。

由于只考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以生产结构为主的结构变量,包括需求、贸易、生产和就业,也就是广义的宏观产业结构。而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均被排除在模型之外,因此从模型结构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纯粹的结构模型,它主要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并且由于假定相关的供给因素是固定的而被排除在结构模型之外。

关于结构变化指数,在模型中是按照如下定义测度的,假设结构变化指数为SI,则

$$SI = \sum |SI_{i,t} - SI_{i,t-1}| \quad (4)$$

其中,  $SI_{i,t}$  代表  $i$  产业部门在整个产业中的百分比;  $t$  代表不同年份。结构变化指数实际上是对结构变化量值测度的具体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劳伦斯在《Can American Compete》书中也采用该产业结构变化指数分析美国产业结构变化率。

## 2.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

1978 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结构变动率高,对应这种高的结构变化率是高的经济增长率。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已从总量驱动转向结构性促进,结构性因素已成为导致和加速增长的重要变量。如表 1 所示,在要素投入水平相同的情况下,由要素投入结构变化引起的产业转型已经开始导致和

加速经济增长。因此,结构转型的速度已成为解释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

从下面结构指数和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图可以看出,两者变化趋势一致,除个别年份外,大部分时间段的经济增长率和结构变化指数基本一致。这表明,结构变动指数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着定量关系,这种依赖关系是上述模型中的  $G_Y = F(SI)$  函数关系。结构性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强调结构效应和充分细化经济增长过程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从而将结构变量引入经济增长过程,引起经济增长函数的转变。在将结构变量设置为宏观产业结构变动指数时,我们建立了新的经济增长函数  $G_Y = F(SI)$ ,使得经济增长函数可以体现为  $G_Y = e^{C*SI} - 1$ 。结构性因素是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它关注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对应函数关系。

表 1 1978—2017 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

年份	产业结构			结构变化指数 (SI)	结构变化影响 C	经济增长率 ( $G_Y$ )
	一产	二产	三产			
1978	27.7	47.7	24.6	5.4	0.4792156	12.30
1979	30.7	47	22.3	6.5	0.3463526	8.50
1980	29.6	48.1	22.3	2.2	0.9564246	7.20
1981	31.3	46	22.7	4.2	0.4058924	4.50
1982	32.8	44.6	22.6	3	0.7675284	9
1983	32.6	44.2	23.2	1.2	1.9982461	10
1984	31.5	42.9	25.5	4.7	0.5615016	13
1985	27.9	42.7	29.4	7.7	0.3694688	16.20
1986	26.6	43.5	29.8	2.5	0.9250142	9.10
1987	26.3	43.3	30.4	1.1	2.1289143	9.40
1988	25.2	43.5	31.2	2.1	1.19116	11.20
1989	24.6	42.5	32.9	3.3	0.4815864	3.90
1990	26.6	41	32.4	4	0.447939875	5
1991	24	41.5	34.5	5.2	0.399892596	7
1992	21.3	43.1	35.6	5.4	0.48604974	12.80
1993	19.3	43.1	34.5	3.1	0.86039619	13.40
1994	19.5	46.2	34.4	3.4	0.74983682	11.80
1995	19.6	46.8	33.7	1.4	1.725652714	10.20
1996	19.3	47.1	33.6	0.7	3.386062429	9.70
1997	17.9	47.1	35	2.8	0.815136571	8.80
1998	17.2	45.8	37	4	0.543687925	7.80

(续表)

年份	产业结构			结构变化指数 (SI)	结构变化影响 C	经济增长率 (G <sub>y</sub> )
	一产	二产	三产			
1999	16.1	45.4	38.6	3.1	0.674794871	7.10
2000	14.7	45.5	39.8	2.7	0.813786889	8.00
2001	14	44.8	41.2	2.8	0.755805536	7.30
2002	13.3	44.5	42.2	2	1.0986123	8
2003	12.3	45.6	42	2.1	1.101207333	9.10
2004	12.9	45.9	41.2	1.7	1.38316194	9.50
2005	11.6	47	41.3	2.5	0.95550512	9.90
2006	10.6	47.6	41.8	2.1	1.171232762	10.70
2007	10.3	46.9	42.9	2.1	1.989030952	11.40
2008	10.3	46.9	42.8	0.1	23.025851	9.00
2009	9.8	45.9	44.3	3	0.7573753	8.70
2010	9.5	46.4	44.1	1	2.4248027	10.30
2011	9.4	46.4	44.2	0.2	11.150072	9.20
2012	9.4	45.3	45.3	2.2	0.9885235	7.80
2013	9.3	44	46.7	2.8	0.772615357	7.70
2014	9.1	43.1	47.8	2.2	0.967378045	7.40
2015	8.8	40.9	50.2	1.8	1.148257111	6.90
2016	8.6	39.8	51.6	2.7	0.756007519	6.70
2017	7.9	40.5	51.6	1.4	1.476330571	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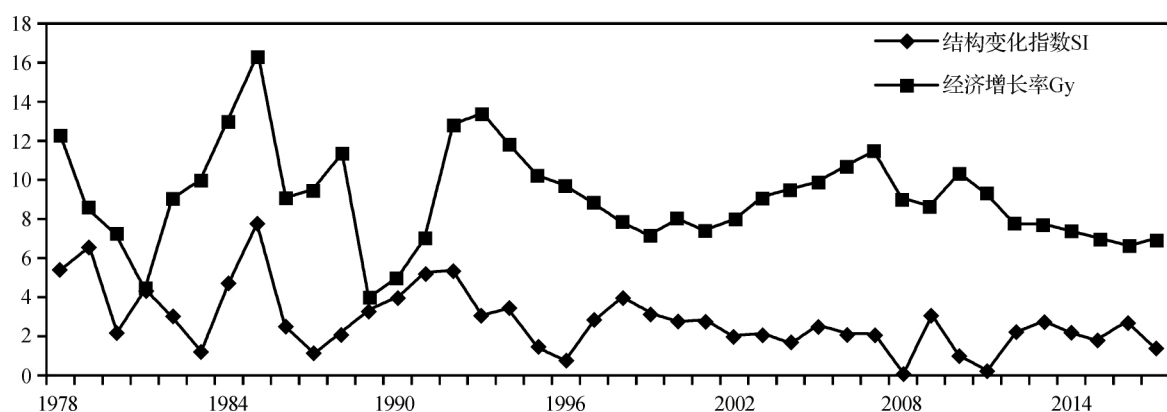


图7 1978—2017年结构变化指数与经济增长趋势图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绘制。

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定量关系表明,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加快结构转型不仅可以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影响经济的实际有效增长。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高结构变动率基

本上与这一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相一致。调整优化结构和经济快速增长相互促进。同时,结构转换的动力学分析也表明,结构转换也具有推动和实现长期增长的动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

表现为经济增长函数的转变,即经济增长函数从强调要素投入的新古典经济增长函数转变为结构主义经济增长函数。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建立一条依靠结构转型来加速增长的有效高速增长路径,并通过实现结构性增长和定性增长来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因此,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关键。

### 3.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特点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各产业间的非协调性增长和各地区之间的非均衡性增长为前提的。经济结构是中国产业及各地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调整被扭曲的结构一方面要求各地方必须追求一定速度的增长,另一方面,加大经济结构优化的力度,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形成稳定持续的发展内生动力。

(1) 增长的阶段性。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这是一个各种经济战略和改革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得到不断试验、不断推广、不断产生巨大生产力的过程。通过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人口先富了起来,在追求效率中实现了高增长,各地区蓬勃发展也实现了国家层面经济社会的发展。前20年经济增长速度快,1984年超过15%;后20年经济增长相对平稳,2012年后经济增长明显低于原有的8%的既定目标。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转换实质上是结构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速度也自然随之而动。

(2) 区域的梯度性。中国区域增长是在以省市为单位的块状区域竞争中实现的,具有明显的梯度性发展特征。1978年之后,经济发展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逐渐向中西部推进。中央政府从全局角度统筹考虑改革与发展问题,而地方政府更立足于当地情况施策,客观上也存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结果只能是加剧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导致结构性矛盾不断累积。这种不平衡存在于地区之间,也存在于城乡之间。以城市发展带动区域发展,是中国实现区域增长的必由之路。然而,城市化在弥合城乡差距的同时,也固化了城乡差别。一方面是对资本和劳动力的渴求,另一方面是将农村劳动力排斥于社会福利之外的政策与行为,加大了精准扶贫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困难。

(3) 改革的稳定性。中国的奇迹离不开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本身就是一个实验过程,在探索中寻求中国自身的生长理论。目前,经济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十分强烈,稳增长、调结构,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直是动能转化的根本推动

力。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一直向前,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迅速扩大的数量增长掩盖了许多结构性矛盾,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被用作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从而影响了中国40年的区域经济均衡增长。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和消费之间的分配趋于不平衡,资本比例继续积累,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在增长之外,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纯粹的增长越来越难以解决结构性矛盾。同时,由于各地方政府发展战略的不同,东、中、西部地区投资和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在政策或相关制度安排下,由结构引起的区域增长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家的长期增长。

(4) 影响的全球性。中国的崛起重塑了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例不到5%,而人口却超过1/5,人均GDP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不到1%。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8.82%,占世界GDP的比例从4.9%上升到14.84%。相应地,中国的出口占全球出口的13.2%,人均GDP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中等收入开放国家,正在完成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变。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很大程度上对外开放了贸易,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些变化逐渐增强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力量,更容易适应和参与外部竞争,增强自身的生长弹性。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GDP增长中,中国贡献了30%以上,金砖四国贡献了60%,全球经济呈现出新的增长格局。时值全球诸多国家受到美国惩罚性关税的威胁或报复,以中国为首的许多WTO成员重申多边贸易体制,主张贸易自由化,正在成为维护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 四、结语与展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一些传统要素的比较优势,如劳动力、土地、资源和政策等要素最为明显,中国工业实现了高速增长。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工业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多种生产要素的供需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原先支撑工业增长的传统要素的比较优势已经逐渐开始减弱。1995年以来,中国工业结构开始呈现显著的重化工业化趋势。一个大经济体以重化工业的发展为主来提高工业发展水平,符合工业结构演变的规律。但相比其他国家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中国重化工业化的推进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和外延式的特点,并且资源消耗高、环境

影响大等问题随着重化工业不断扩大被迅速放大。在中国的工业增长中,资本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持续的大规模投资提高了整个工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但是随着资本投资的增加,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出现了资本排挤就业的情况。劳动力仍是中国最充裕的生产要素,但在工业生产中劳动力使用比例的下降降低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近年来,工业中出现的重复投资和过度竞争进而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影响到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平衡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并降低了资源的使用效率。除传统产业外,因地方政府为新兴产业提供了大量不合理的优惠政策,导致了新兴产业也开始逐渐出现重复建设。碳纤维、风电、多晶硅、锂电池等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已经先后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

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不断增加,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仍在于较低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成本,以技术为主导的竞争优势还未形成,中国出口企业对国外订单、国外投资和进口装备、核心元器件等的依附性较强,因而在贸易比重有所增加的情况下,中国仍是以高成本、高耗能的形式参加国际分工,中国的贸易利得较中国参与贸易的比重不平衡,“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发展还面临诸多阻力。虽然中国的信息产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中国在利用信息技术对工业产业进行推进时,仍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中国仍未取得信息化工业产业的最新技术,另一方面,中国在已有高新产业中也存在相应的技术瓶颈与障碍。1990年前后,随着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国高技术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逐渐成为优化中国产业结构的重要推动力。虽然中国具有大型科技项目集中攻关的历史与优势,高新技术产业总量也扩张迅速,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产品的高新技术含量不高,拥有世界水准的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高新技术产业所形成的生产力不足以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高速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也还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改

革开放40年,中国确实富了起来,国家实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向纵深发展,需要啃硬骨头;对外则更需要我们韬光养晦,继续奋斗,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参考文献:

1. Acemoglu, D., and J.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12.
2. Chenery, H. B., M. Syrquin, and H. Elkingto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 - 197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1975.
3. 汪海波著:《新中国工业界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
4. 西蒙·库兹涅茨著:《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5. H·钱纳里等著:《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6. 闫衍:《经济增长结构分析》,《经济科学》1997年第4期。
7. 干春晖等:《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8. 厉以宁:《经济改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88年第12期。
9. 周叔莲:《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几个问题》,《中国工业经济》1998年第7期。
10. 刘伟、张辉:《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
11. 吕政:《我国工业调整的九大任务》,《经济研究参考》2013年第46期。
12. 金碚等:《中国工业转型升级:进展、问题与趋势》,《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陈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执行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邓斯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硕士生(北京 100044)。

[责任编辑:李慧]